



香港馬地成道一十八號
電話：五三七三二一

訊

胡鴻烈

承印人：明印印刷公司
香港馬地平街四號地下

香港樹仁書院商學院主編

一九七四年一月

企業管理者所面對的「態度」問題

關於態度問題，我們可以作如下的歸納：

- 一、假如態度是建立在個人的本性上，是不可能用普通方法（如說教）加以改變的。然而，在若干情形下，整個羣體的态度是可以改變的。
- 二、為甚麼改變羣體中某一成員的态度常常是辦不到，而只能在他們成整體的情況下才可改變他們的态度呢？理由很簡單，因為羣體的存在與功能，必須維繫在共同的态度上。
- 三、人們嘗試以說教形式或邏輯推理去改變別人的态度，結果也是徒勞無功的。正如沙里夫（Sherif）在他的社會心理學概論 *An Outline of Social Psychology* 一書中說：「很多實驗證明，希望以事實來據理力爭，以求改變他人的态度和社會偏見，都得不到成效。很多研究員從這類實驗所得的結果，竟是一些改變也沒有，雖然有些或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變，其中往往包括有反效果的情形。可見要改變態度實在並不容易。」
- 四、我們雖然不能把一種態度改作另一種態度，但泰來 G. R. Taylor 說：「我們可以把那些遠離實際的態度帶回到較實際的境界。」
- 五、人們愈是在一種不明確的情形下（通常指對實際情形未能充份瞭解），通常便愈會形成這種衝動的态度，也就更遠離實際。
- 六、假如羣體中的某一份子不肯接受羣體本身的态度時，他可能是基於下列的三種因素：
 - ① 他可能較其他人聰明，而且他已往經驗，與羣體的态度有衝突。
 - ② 由於他的反叛性，而不能融冷地與其他人交往。
 - ③ 他所屬的羣體並非他要追隨的羣體。

由第二、三兩點，我們所能得到的結論是即使向一班人說教或針對某個人說教，通常不能改變他們的态度。又根據第四點，我們的結論是當態度愈是接近實際時便愈難改變。（譬如，有些事情令到一羣受同樣文化薰陶的人都產生反感，那麼，要他們不發生這種反感，只要把那些令人反感的因素從環境中剔除便可以了。）

第五點雖然指出態度一旦形成，就算事實放在眼前也不能令其改變，但假如對環境是清楚的，則遠離實際的态度就不易產生了。因此，正如艾頓·美奧（ELTON MAYO）所說，當一家公司的政策愈是明智的時候，便愈需要使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對政策有澈底的瞭解，這樣才可能使這政策達到預期的收益。對事實缺乏清楚的瞭解，只會引起謠言，戰時的經驗充份說明此點。

為了避免誤解，我們應深入談談個人信念與此個人所屬羣體的信念之間的關係。我們想弄清楚的是，一個與其羣體意見不合的人，不一定表示反叛，個人永不會為邏輯爭辯所說服。當然，單獨個人往往會接受相當合理的解說而改變其原有態度，但我們所指的，是改變一羣人的問題，而且事實上，很多實驗都證明羣體中的多數不會單為理智而改變其態度。其中理由很多，現請只談四個：（一）當我們嘗試把一個人的態度改變而令到其態度與其羣體有很大的衝突時，就等於要他與其羣體對立，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羣體對他的尊重，比持有另一態度更為重要，因此改變往往是不可可能的。（二）態度可能是該羣體所面對環境中的一個功能（也就是說，它們是客觀的存在）。（三）向他人說教可以說是說一種口頭攻擊，很多人心裏會對此發生反感，而且當我們要改變他人态度的時候，我們便是在局部地攻擊那人，指出他的錯而說明我們是對的。（四）不論理想在社會上佔何等重要的地位，但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却並不被重視。至於反叛性與反傳統思想的關係，我們可以說有反叛性的人，通常都有反叛性，而有反叛性的人，通常都有反傳統思想。反叛性是一種對社會的反動，就像弗洛伊德（FREUD）很久以前指出的，反叛性是犯罪性的另一面，犯罪的人作出意識的反動，而反叛的人作出無意識的反動。可見，既定的社會裏，很多有反傳統思想的人都被當作反叛。一個分析中的社會當然亦有很多衝突的觀點，這都是因為思想混亂而形成，而真正反叛的例子也很常見。

說教，邏輯論辯，與個別接觸都不能成功地改變羣體。要想成功，最有效的方法似乎是小組討論。很多實驗都足以支持這說法。以下的例子，是引自弗朗察 FRENCH 與哥察 COCH 在期刊「人羣關係」中發表的論文。（下略）

侯活是一間製造睡衣的公司，位於維珍尼亞 VIRGINIA 的瑪利安市 MARIAN，員工大概有六百人，多數是女性，平均年齡是廿三，工資是按件計算。生產是以「標準分鐘」為標準，意思是每一「標準分鐘」生產過程都能得到若干件。一個能幹的員工每小時大概可得六十件。這間公司常因員工的士氣問題而苦惱。產量過低，

定政策以解決以上的問題。他們選擇了四組工人，每組工人的技能都差不多，出產都是在每小時六十件左右。時間行動專家負責分別通知這些員工在工作和新率上的改變。第一組只通知他們應做的件數，然後便任由他們自行工作。第二組組舉行了一次小組會議，在會中，專家們解釋了減低成本的重要，然後徵求員工對簡化生產過程的意見，而且聲明生產員在接受一新新率前會受到新方法訓練。最後，製定出一個共同認許的方法，與員工一同策劃改變和重訂新率。第四組也參加討論，但不同的是，只有少數成員接受訓練，然後由他們訓練其他組員，薪率則按他們的表現來決定。結果第一組始終未能在一小時內生產超出五十件，而且在四十天內有百分之十七

的組員離職。第二組達到七十四件的高紀錄，而且無一組員離職，為了肯定以上結果的正確性，再把第一組集合起來（當時這些組員正在向工會投訴薪率不公平），同樣用第二組的方法對待他們，一星期後，他們也達到了七十三件，而且不再有任何投訴與離職發生。（下略）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情況道理很簡單，一個人是不喜歡像機械一樣的被指使，他們希望參與一件共同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往往強調「我們」而不是「他們」。總之，人們對別人訂下的目標往往不感興趣，但當目標是由羣體自己訂下的目標，使羣體把公司希望達到的目標視為自己的目標。因此羣體與公司二者合而為一，所產生的力量是可促使目標早日實現。

（試譯自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DUSTRY: J. A. C. BROWN）

鍾期榮博士

我對學生運動的一點感想

五四時代的中國青年，在「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的大旗下，揭開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使愛國賊喪胆，列強震驚，舉世矚目，酣睡中的中華民族魂從此驚醒了，開始向西洋文化迎頭趕上，於是五四運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主張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學」甚至一味崇拜洋華，對優秀的文化傳統視如蔽屣，而徒有其名地學了些西洋文化的皮毛，不倫不類，非中非西，人際衝突，精神崩潰，近五十年來國事坎坷，或可說種種因此，由是可知學生運動影響之深遠了。

近十多年來，世界各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有如一股狂潮般衝擊着每一角落，舉其甚者，法國的學生運動會使戴高樂將軍下台，法蘭西面臨政治危機；韓國學生運動迫使李承晚總統出走老死國外；泰國最近的學生運動，一夜之間使乃他元帥解職去國，此種種驚心動魄的學生運動，不勝枚舉，其為禍為福，亦難定論，惟有留待歷史家去作出公正的評斷和史實的證明了。

誠然，一言足以興邦，一言足以禍國，何況是眾志成城，團結便是力量的學生運動，其足以左右輿論，領導羣衆，繫社會安危，更是彰彰明甚。健全的學生運動，是促進民主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先鋒，亦是社會進步途程所必須的。相反地不健全的學生運動則每每為別有用者所利用把持，成為政治武器，摧毀現有之制度破壞社會秩序與和平，其破壞力之強，為害之烈，有如一場浩劫，留下來的滿目瘡痍需要不知多少時候方能復原。例如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已足為殷鑒。而最近的泰國學生運動，於推倒了軍事統治政權後，那些暴動的學生，隨即變為維持秩序清潔街道的衛兵，那種自律的精神，又是多麼令人欣賞！在學生運動演變為激烈行動時，學生以血肉之軀，出入槍林彈雨，每每以悲劇收場，其代價為何？亦殊足驚人。但因其有破舊立新之功，給人以希望和鼓舞，故破壞便是建設的開端。否則有破壞而無建設，破舊而不立新，徒為社會隱憂和動亂根源。

因此，如何「才是」和「才能」成為健全的學生運動，便是學生運動的核心或關鍵問題。首先學生運動之目標為何？是否正確？其次學生運動之組織如何？是否健全？又其次學生運動之領導人為何？其立場為何？出發點為何？此數者，均足以成為學生運動是否健全之決定因素。倘

鍾期榮博士

使目標正確而組織不健全，每易為其他外力所介入使之中途變質。又即使目標正確組織健全而領導人沒有骨氣不講氣節的話，亦每易中途變質而全體利益。觀乎五四時代學生運動中之佼佼者，其中亦有不少人墮官晉爵，顯赫一時，一旦身為顯要，五四的精神便早已不復存於腦海了，其於國計民生何？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乎！

況今日青年甚多好高騖遠，自大驕傲，其責人也重以周，其責己也輕以約，既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更沒有虛懷若谷的態度，毫不講義氣，更談不上骨氣，也不具責任感，自私自利，滿腦子功利思想，充滿了利慾薰心，只想陞官發財往上爬的念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作風，更是令人側目。本來青年人之可貴，貴乎其天真純潔、有熱情、有勇氣、富正義感、富理想、富創造力，故能不滿現實、勇於進取、敢於挑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是這種特質，在今日青年中早已不復存在了，又怎能希望他們憂時憂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其能潔身自愛力爭上進者，已屬難能，至於為個人名利而追奔逐鹿，尤屬平常事；其下焉者則為奸，挺而走險者亦比比皆是。特別香港政治環境複雜，香港青年早熟，在充滿功利色彩的教育腐蝕下，其能不向現實低頭者鮮矣，故極大多數學生，均囿於個人之小天地，為文憑學位個人前途出路而忙，無復閒情與勇氣去關心參與學生運動，故對學生運動反應甚為冷淡或甚至漠不關心；只有極少數先知先覺，富理想與熱情的青年，才真正有興趣去搞學生運動，對他們這種犧牲小我敢向現實挑戰的精神，自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但他們真的是心懷大志，憂時憂國，要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抑或只是別有用心，為個人出風頭，為個人名利打好出路？或認識不清，競尚時髦，致為他人所利用？這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才心知肚明了。

我絕無意批評或攻擊當今香港的學生運動，我認為如果學生運動是純潔的正確的，必能贏得羣衆的支持與鼓掌。反之，則必不起現實的考驗。但要想學生運動純正，必須參與學生運動的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辨別能力，能明辨是非，能本着自己的良知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否則只憑一時衝動，盲從附和，人云亦云，結果給人牽着鼻子走，可悲亦復可憐。因有所感，爰書數言，聊供參考，願加勉焉。

工人流動率高的問題常出現。而且員工對於管理、監督和時間行動研究員之間往往採不合作態度。因此公司決定另定政策以解決以上的問題。他們選擇了四組工人，每組工人的技能都差不多，出產都是在每小時六十件左右。時間行動專家負責分別通知這些員工在工作和新率上的改變。第一組只通知他們應做的件數，然後便任由他們自行工作。第二組組舉行了一次小組會議，在會中，專家們解釋了減低成本的重要，然後徵求員工對簡化生產過程的意見，而且聲明生產員在接受一新新率前會受到新方法訓練。最後，製定出一個共同認許的方法，與員工一同策劃改變和重訂新率。第四組也參加討論，但不同的是，只有少數成員接受訓練，然後由他們訓練其他組員，薪率則按他們的表現來決定。結果第一組始終未能在一小時內生產超出五十件，而且在四十天內有百分之十七

鍾期榮博士

遊台生活點滴

人寶

不知是心情興奮的關係，還是對台灣環境陌生的緣故，雖然經過了一段奔波的旅程，身體異常的疲倦，但晚上竟不能入睡。與同房的張美瓊、陳少敏談了整宵的話。

第二天清早，驚聞號角三催，我們才掙扎着爬起床，強撐着那像要分裂了的身軀，慌忙收拾床褥，梳洗穿衣，還要連跑帶跳的衝到廣場上去集隊，升旗，唱國歌，聽訓話，一連串的疲勞轟炸，使我那雙本來倦得抬不起的眼皮，更像墜了鉛一樣，沒法張開來。

好不容易捱到吃早餐的時候，散隊的號角還未響完，我已與莊、美二人，用第一時間搶進了膳堂。幸好今天的早餐還算豐富，味道亦頗甘美，這才稍為補充了一整夜沒睡的消耗。

剛填飽了肚子，我們又要開始抵台後的第一個節目。唉！你道是什麼節目？原來是到台灣政府屬下的各部門去作拜會。從文化學院出發，要坐上四十五分鐘的旅遊巴士，才能到達目的地。跟着還要接受那些部門首長的歡迎詞，其實就是訓話。好吧！他在台上說教訓，我們在台下得「覺醒」，但聽他愈說愈激昂，愈說愈興奮，大概是看見我們頻頻「點頭」稱是吧！

就我個人來說，在遊台各各個節目中，以訪問屏東涼山基地那一天最為刺激及值得回味，因為在那裏我們可以受到軍事訓練，其中包括爬山、跳傘及射擊等。這機會真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呢！

首先，我們要爬上一座五、六層高的塔，受訓者先在腰間繫上安全帶，帶的另一端則連在塔頂的一條鋼纜上。鋼纜與地面平行着一直伸至對面山的山峯。當跳傘者跳出塔外後，身體下降至某一限度，便會沿着鋼纜滑行至對山，安全降落地面。這訓練只是用以鍛鍊跳傘者的胆色，所以不須要顧及跳傘各方面的技巧，只像跳樓一樣跳下去便可以。

記得在真正開始的時候，第一位跳的是一個日本華僑青年，身高六呎，體格魁梧。只見他好不神氣，昂首闊步的走到跳傘門前，但當他向下一看的時候，整個人像被電觸着似的，顫震了一下，跟着凝立不動，教官再三催促他跳，他却彷彿不聞，我從後面看見他的二條褲管不停地抖動，真不知是風吹還是他腳震了。嘿！待會兒看本姑娘露一手你瞧吧，包管中輻勝過鬚眉。

不知道什麼時候，輔導員為我解下帶子，但雙腿却不聽使喚，總是軟綿綿地站不起來。唉！當年石秀在沒有安全設備下跳樓，還可以劫法場，衝鋒陷陣而無懼；但我在有安全設備下跳樓，却嚇得連站也站不起來，真丟人！

不知是台灣的馬太高，還是我太矮的關係，當我面對那匹高頭大馬時，簡直是無法坐上去，差點兒後悔沒帶乘梯上來。

幾經艱苦，才由莊等半推半扶着，狼狽地坐上了馬鞍，雙手死執着韁繩，雙腳緊夾着馬腹，怕從馬背上跌了下來，摔個半死。

馬起步的時候，雖然有馬伏在前面拉着走，但總是一步一驚心，恐怕那畜牲狂性大發，發足狂奔，那時我真是發狂了。漸漸地，我的恐懼心理消失了，於是忙嚷着莊給我拍照，仿着電影上的英雄策馬馳騁的英姿，好不威风。

清晨四時許，我與莊、美二人爬起床，靜悄悄的跑到廣場上，說

它在山峯的後面，露上半個頭來。嘿！原來在陽明山欣賞日出，竟是要等到日上中天的時候，才能見到的。

在離開台灣的前幾天，全是自由活動，我與美常跑到台北去逛公司，上館子，吃了許多未嚐過的美食。

直上上機回港的時候，我問她對這次旅程有什麼感想，她頻頻地說：「不來也罷，不來也罷！」

「不好玩嗎？」我問。「不是。」「不便宜嗎？」「不是。」到底是什麼原因？她始終不肯說。

到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回港時的體重，比去台灣時重了六磅，使她在過去一年中辛辛苦苦地節食所減去的體重竟在二十多天的旅程中回來了。怪不得她說不來也罷呢！

耐心地等着，等着山後漸漸露出了曙光，但只能看到光度的加強，卻不見太陽的蹤影。直到早上九時左右，

魯迅先生不朽之筆，傳了一位在中國歷史上名垂不朽的人物。阿Q先生的大名，相信沒有誰人不曉得，就是我家八歲的小鬼頭，被鄰家頑童打在地上爬不起來的時候，也會不屑地斜着眼睛，模仿阿Q的口吻說：「總算被兒子打了，這世界……」

阿Q先生不但揚威未莊，也名揚海外，連洋先生也從譯本中知道這個人物了。他的名字既然這麼響亮，怪不得人人都對他仰慕而神往之，只恨老娘出嫁太遲，否則定然早幾年降世，也許說不定能參予一觀其面目風采此一大盛事。不過現時也不大壞，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神龍似的活現於道林紙上，只需花上一元幾角，就可把阿Q先生據為己有，效法其一舉一動，一怒一罵，也就不難學得其神髓，掌握那長勝不敗的騙人法寶。

阿Q先生「先開關」，「見識高」，而且「真能做」。他的獨步丹方精神勝利法，更使他無往而不利，上帝也難不倒他。有一回，蒙趙太爺賞了個熱辣辣的巴掌，捧着左頰哭喪着臉惶惶而退，後來想：「現在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於是想到高人一等的趙太爺現在是他的兒子了，他豈不是成了人上人麼？愈想愈有道

理，也就忍不住飄飄然然而飄飄然起來了。

阿Q革命不成反被拿去殺頭。在趕赴刑場遊行示眾之時，想不到阿Q却處處泰然，沒有驚惶，也沒有失措，他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不免要殺頭的，最後他還是豪氣地喊出：「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他較沙特筆下流汗撒尿的伊比達要堅強多了。

果然，不到二十年，阿Q的孫子孫一個個跟一個的鑽出來了。

阿Q先生見識認真廣闊，不着邊際，他見過城裏的油煎大頭魚，居然不是加上半寸長的葱葉，而是加上切細的葱絲，於是他便認定這

是錯的，可笑的。阿Q的孫子孫於是推而廣之：「寫字而至於用墨水筆原子筆，是錯的，是可笑的，不但夠不上藝術，而且還有失體統。」繼而儒服儒冠，道貌岸然的高聲朗道：「寫中國字而不用毛筆者，不知其可也。」

有一回，洋朋友美利堅先生誇口道：「咱們的電子計算機已經雄霸天下，誰個及得上？」他的口氣大極了，阿Q的孫子孫於是發難而起，不屑地說：「電子計算機有啥了不起，咱們有孔孟，有老莊，有仁有義，有禮儀，有不謀其利，知書識禮，才真個了不起呢，你們物質文明比咱們進步二百年，可知道咱們的精神文明比你們要進步二千年呢，咱們曉得用箸箸吃飯的時候，你們還不是拿着刀叉吃人肉？」

一輪搶白，說得洋先生威風掃地，奈何不得。在座各人無不個個佩服他們的高論與見識，替自己人爭一口氣，感激之餘，也就紛紛申請改名換姓，爭做阿Q的孫子孫了。

又一回，倭先生眉飛色舞地誇耀他們的茶道，棋道，還有花道，劍道，空手道，名目繁多，說得口沫橫飛，威風八面。阿Q的孫子孫又不服氣啦，跳出來打岔道：「你神氣什麼？這些東西，原本不是咱們的嗎？咱們先前比你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你們的留學生，要不是經咱們老祖宗悉心指點，那裏會有今日的成就，現在倒回來班門弄斧了。」這樣經他一說，咱們全都反敗為勝啦，人人喜形於色，對阿Q的孫子孫產生無限的敬意。

魯迅先生揮淚槍斃了阿Q，靜修庵的小尼姑也帶淚咒罵阿Q斷子絕孫，誰料到這位偉大人物竟具有這般無比的魔力，他固然從此消失了，可是直到如今，阿Q精神飛滿天，阿Q子孫跑遍地，是中國之幸？是人類之幸？

阿Q的子孫

工管系三年級 王 晚

會計小組

會計小組是樹仁學生在今學年成立的一個學術小組。它的成立雖然倉卒但已有組員五十多人，其中包括一、二、三年級商管會銀系日夜校同學。

會計與社會

為甚麼我們以會計為研究對象呢？原因是各種機構，包括工商業、社團、服務組織，都需要在經費方面有完善的管理，以達到物盡其用，造福社會，擴大發展的目的，而會計學是處理這方面問題的一種科學。它的正確了解能使人明白自己工作的機構，以至社會各方面的演變，是否健全。它的良好運用，能使一機構發揮最高的效率，使社會安定。經濟動力是社會的命脈，而會計學正控制着經濟的動力，因此，如果你對社會命脈有興趣的話，你便必須對會計學有充份的了解。

競爭工具

試想一個團體，如果沒有良好的會計制度，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呢？，很明顯地，一定有浪費的現象，而且也給一些心懷不軌的人有機會可乘，濫用公款，中飽私囊，對該團體故然有害，而對社會也沒有好處。同樣地，一間工商機構，假如對會計這方面不加注意，也會引起成本不必要的增加，使產品價格上漲，加重消費者的負擔。況且，在現今處處講求效率的社會中，不必要的浪費，對競爭力力量是一致命的打擊，物競天擇是現實的格言，弱者便會遭受淘汰的厄運。如以香港的形勢而言，競爭便是生存之道，要保持「東方之珠」價廉物美聲譽，便一定要在提高品質，減低成本上下工夫，從會計的無情文字中，便可尋出甚麼地方需要加以改善。

互相切磋

而且，會計這門學問，並不是閉門造車便成的，一定要互相切磋，觸類旁通，才可以有全面性的了解，因此我們覺得有成立一小組，方便同學一同研究的必要。

專業資格

同時，為了便利同學投身於香港社會，替香港發展盡一份力，因此我們以英美會計並重作為最終目標。同學如參加校外考試，一方面可以從比較中明白自己在會計學方面的修養，更可獲得國際認可的專業資格，假如有一天會計小組的組員畢業時，都持有專業資格，那將是會計小組的光榮，也是樹仁書院的光榮，對社會也更能作出貢獻了。

寂寞的心靈

黃思騁

七年前的九月，我到離吉隆坡七英里的一間中學去教書。這間中學既不是英文中學，也不是華文中學，而是一間標榜中英文並重的學校。在假期中，我已作好準備，打算在半年之內回香港，後來一個朋友跑來同我商量，說是有間公教中學的創辦人兼校長要我幫他一年忙，因為華文教師十分難請。我呢，多少年來都沒有什麼常軌生活，多留兩個學期也無妨，便也答應了。

這間學校位於八打靈加那衛市的人口處，剛成立不久，校舍全部是新的。學校裏的教師，除了少數的幾個以外，都是天主教會的修士，多數是北方人。校長董修士，河北籍，我在檳城的一間學校裏見過他，他當時也做校長。這人年紀輕，精力充沛，喜歡到處闖關面，但都不算成功。

在星馬地區，閩粵籍以外的中國人不多，據說只有四千人。這些修士都在中國跑過碼頭，大家在風土人情上比較接近，因此還算合得來。我對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很差，這大概是個性造成的。初進這間學校，我就有一隻陌生雞進入雞羣的拘束感，尤其是身處那些印度教師、馬來教師、和受英文教育的中國教師之間。他們都用英文談話，而且佔絕對多數的地位。留下來的幾個華文教師，我又不大合得來，其中有一個年紀很輕，剛從教師訓練班出來，相處得比較好。另一個一坐下就發牢騷，好像懷才不遇的樣子。實際上假如他能夠在教學上多花點精力，對別的事不要如此熱中，怨尤就會減少許多。

修士們另有休息室和活動地方。他們的宿舍就在教室的樓上，我從來不到那地方去，其餘的人也不去。因此除了公事，我很少跟修士接觸。在我的授課表上，除了每週二十二節華文，還有兩節體育。我起先以為是弄錯，便跑去找董修士。他告訴我找不到體育教師，只好讓各教師分擔。我說我從來沒有教過體育，他說不成問題，到時讓學生自由活動就行了。當然，讀了這多年書，怎能說不會教體育，連看也會看了。除了田徑，我對各項運動，一向喜歡，有些項目不比一般體育教師更差。我之所以找校長，只是想證實華文教師不是兼教體育而已。

我對英國的學制總是不大了解，這或者是因為頭腦裏有着自己的學制的緣故。我們的學制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一共六年。他們採的是混合制，初高中共五年。所以我第一天進教室，就問他們這一班相當於高中幾年級。話剛說完，坐在前排的一個學生嗤嗤一下笑出聲來。沒有問題，他在藐視我，認為華文教師應該有這種常識。班長坐在窗口的角落裏，大聲叫他的名字，以示警告。後來我弄清楚了，他們相當於高中二年級，是五年制中最後的一年，說二年級並不妥當。

這一段日子天氣相當熱，從我的住處到學校又有兩個公共汽車站那麼遠。早晨去學校上課還沒有甚麼，中午回家時候可就辛苦了。這時烈日當空，地面熱氣蒸騰，車站上既然車稀人多，

倒不如步行回家。

日子一久，我漸漸不喜歡這間學校，原因或者在於它的管理不像華文學校，使你有一種歸屬感。你在學校裏教書，只是上課下課；你不關心別人，別人也不關心你。有時沒有課，躺在休息室的臥椅上，外面是一片刺眼的陽光，蛙蟻在四周的樹枝上啼鳴，就會有一陣陣的寂寞感來到你的心頭。

我教這批學生也不像教華校學生那樣賣力，事實上他們的華文很差，而且大家馬馬虎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學英文。既然如此，賣力也是徒然。

在第一學期的末尾幾天，我發覺其中有一個學生對華文十分重視，這是我從他的作文簿上所得的印象。這孩子是廣西人，來自一個偏僻的鄉村地區，家裏是種田的，環境不大好，他來吉隆坡進中學，一定是件大事。

這孩子面黃肌瘦，天份不高，但是十分用功。我有一次在街上遇見他，看見他在那裏買菜，大概是自己做饭。他穿一件很稱身的襯衣，分明是小學時代留下來。物物之艱難，可以從這些地方顯示出來。他告訴我他住在離市鎮不遠處的一間木屋裏，和他的堂兄合住一間房，自己做飯吃。他的堂兄就是我第一天去上課時，在我發問時笑出來的那一個。

後來，我遷居到另一區，那地方離學校較遠，而且是個以馬來人和巴基斯坦人為主的地區，

樹仁書院社區服務團於去年五月移交社會及社工系負責推行一切事務及有關活動。

心理上就更顯得寂寞。

弄花盆，也打發掉不少時間。有一次我把一種紫色的花（始終查不到學名）種在前門的空地上，不久就發展到像斗笠那麼大。這種花在早晨開放，到日落時凋謝。每到中午時分，一百朵以上的花競相開放，發出一種耀目的閃光，好像它們本身就具有放射性的。那些過路的人，都禁不住駐足在籬笆邊觀看，有的還向我要一枝回去種植。其實這種花在馬來亞到處可見，在香港也有，只是從來沒有長得如此茂盛的。那些人來要花，一定誤以為是特別的品種了。

因為寂寞，有時也會童心勃發，在夾竹桃上用火燒那些像手指一般粗大的綠色肉虫，看着牠們掙扎着身子落下來。到了晚上，用腳踏碎草地上的硬殼蝸牛，發出的聲音好似踏着了蛋殼，怪難聽。還有就是追打那些據說沒有視覺的土撥鼠。這些東西有一身灰色的茸毛，尖嘴，利爪，行動遲鈍，邊走邊發出啾啾的叫聲。其實牠們食蝸牛，倒是益虫，原不必一定打死牠們。只因我無聊，牠們又偶然進入屋子來撒糞便，我也就師出有名了。

日子過着，到了有一天的下午，我正坐在門邊的桌子上校對一份從香港寄來的稿子，忽然聽見有人推開了籬笆上的鐵門。我伸出頭去一看，是我的學生凌亞鴻。他走進來，叫了我一聲，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

我對這一型的孩子十分瞭解，他們生來性格

了整個上午佈置場地，下午開始前五分鐘，鍾校長與D, I, 工管系主任 Dr. Mc Gray 突然到訪。據大會主席說鍾校長因不能抽空，未能到訪，因此她的駕臨使各同學精神為之一振。此次大會各攤位獎品豐富，孩子們都滿載而歸。遊戲會如期舉行，地點與上次相同，遊戲性質是分組比賽，因各組實力均衡，每項遊戲進行時競爭相當激烈。就以其一為例，兩男兩女分別站在擺成正方形的椅子上，雙手同時拉住圍成圓圈的繩子，號令一發，四人同時用力將別人從椅子上扯下來。真夠刺激。

關於參觀大埔嘉道理農場一事，因通訊發生問題而被迫取消。

上不甚合羣，家境清貧，受父母忽視，連學習說話的機會都不多。

我對他的過訪起先感到有點不耐，因為他坐得太久了，而我和他一樣，也是個口才拙劣的人，談話時不斷冷場，使時光特別難熬。不過一想到他也許把我看成世界上唯一可以親近的，不過一末這不就是一種功德嗎？何況在馬來亞，在這種漫長而寂寞的下午，我也一樣無所事事。

這以後，他又來過幾次，直到我離開馬來亞為止。

我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寫信給我，說他在一家洋服店裏幫忙，月入極微，但已省下錢來買一架打字機。過了些日子，他的堂兄，那個在課堂裏藐視過我的學生，也寫了封信給我，向我訴說他的苦悶，工作不稱心，要我指點他，我回了封信，說些老生常談的話。其實，活在這個時代裏，我自己也是個需要指點的人呢！

原來少，我們一枱坐六至七人，所以每餐都十分豐富，而隔鄰那班青少年似乎不足夠。早晨起身，宿舍外面下着毛毛雨，原定的晨操不能舉行，其中一位導師提議在睡房內空間做早操，信不信由你，我們睡房的空間能容納三四十人作普通體操動作。兩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消磨於室內，於是組織室內球類比賽，有乒乓球、康樂棋、象棋、羽毛球。比賽過程相當緊張，尤以象棋為甚，最後殺得難解難分，要以得分多少排冠軍。有一個戶外項目——游泳本可有機會舉行。最初各學生表示海邊不夠闊大和沒有浮台設備，一定要到東灣那邊。很不幸東灣懸掛紅旗，為了安全起見，就取消了最後的機會。大致說來，除氣候的阻撓外，各學生都能愉快的渡過兩天的假期。

旅行大潭水塘是最後一項，那天適逢雨後，天朗氣清，風和日麗，經過兩次的開餐後，還有足夠供給第三次的食物。到達水塘，下面貯滿了水，因為水塘滿溢所致，不少弄潮兒在那裏游泳，經不起天然美景的引誘，除四外，各人均先後着衣服下水，浸淫在清涼的山水中，享受着不可思議的快樂。

總括起來，整個暑期活動進行不十分理想，由於今年暑假氣候變化反常，及籌備過程欠完善，致參加人數不如理想，可能是各籌備工作同學聯絡不夠。值得一提的是各位參與幫手的同學都能犧牲一部分寶貴的時間為社會盡一點力，已是難能的了。

社區服務團——暑期活動花絮

星期四那天，一風姐威脅本港，星期五已懸掛一號風球，而夏令營則於星期六下午入營，似乎有取消之必要，經是晚緊急商討後，決定如期舉行，星期六風球除下，但參加人數只得原來報名的三分之一，不必說是風球影響所致。整個旅程高低潮疊起。當船駛離維多利亞港，即被風浪控制，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包括導師在內，有四分之一的人暈船，直至船泊長洲碼頭。由於氣候影響，將一部分計劃臨時更改。營地是長洲明愛中心。到達營地時已有一批青少年比我們早到了。我們分配到一間非常寬大的睡房；飯桌原本一枱坐八至十人，由於人數比

歐遊雜感

鄧祺殷

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見學問與遊歷關係的密切了。我，非常幸運地獲得了一次免費歐遊的機會，且容我在此一述我個人的感受吧！

校監的一語

當我獲悉入選為星島日報讀者免費歐遊團之一員後，我便向校監，校長致謝，校監以親切的言詞說道：「你不用多謝我，是你自己得來的，多謝你自己好了。」就這麼一語，更使我深深的感謝他，感謝他給我這無形的鼓勵，給我加深的做人應該奮鬥的信心。沒有自我的奮鬥，縱然機會就在眼前，也難以獲取更大的成就；再推廣而言，便是天助自助，自助後人助的道理。雖然是一短短的一句話，對我已有一定的勉勵作用。

從挫折得來的教訓

出門人最怕是誤入「黑店」，一時不慎竟遭賊人劫去盤川，因而流落異鄉，別以為這只是武俠小說中的橋段，在我們歐遊的首途——荷蘭阿姆斯特丹便已發生過一件類似的事。六位團友因入睡前忘記鎖門，便被夜盜乘機入屋竊取了部份財物，一位團友的護照亦不幸被偷去。於是其他未受損失的團員均捐出一點金錢，給與那幾位受害者，作為對他們的一種關懷及幫助。我們經驗豐富的領隊，便藉此說明了出門人應互愛互助，同舟共濟的精神，以解決當時的困難；一時的挫折正好作為日後的教訓。魯莽大意，總要從痛苦的教訓中換取經驗；而小心謹慎，則每每能從一個人的挫折中體會到真理，從這事件我們體會到一個人的挫折，決非偶然，他自己總得負上一點責任。

在外國人眼裏的香港人

在以往香港人一向很少有遠遊，一因經濟，再者是思想問題；大都認為旅遊是奢侈和無謂的浪費；但最近數年，由於生活水準的提高，思想潮流的進步，一般人對旅遊已有了新的觀感，我們不但能一嘗當地風土人情，藉此增廣見聞，更能從旅遊中獲得身心舒暢，恢復疲勞之效，這更有助於提高日後工作效率。基於上述原因，一般中上家庭已興起了遊埠的念頭，但由於這只是開始時期，所以大部份旅遊地點仍局限於東南亞，如星馬泰台日等地，很少有機會前往歐洲，因此歐洲人對香港人缺乏認識。

反之，日本甚多大機構每年均有贊助其僱員出外旅遊的計劃，所以日本人的旅遊機會比香港人多，每年往歐洲旅遊的人已不斷增加，歐洲人因此對日本人有較多的認識。在我們的眼光中，中國人與日本人是一望而知的，但對外國人來說，中國人與日本人可沒有多大分別，好像我們只知道他們是「紅鬚綠眼」的洋人，却弄不清他們是甚麼國籍一樣。當那些歐洲人見到我們時，總以為我們是日本人，使我們心裏總有點不舒服。

或懊惱。但實際上也難怪他們有這樣的誤會，要是我們香港人（或總稱中國人）能有更多的機會旅遊，與外國人接觸，便不會有這麼多的尷尬情形了。

是悲還是喜

在參觀一次奧國民族舞蹈表演晚會後，我們不但對自己在外國人眼光裏的認識加深了，更對自己切身體驗有了新的認識。原來在晚會結束之前，表演者陸續唱出各國的國歌，並揮動着各國的國旗，以表示對蒞場的各國嘉賓致敬，每一國的嘉賓，當聽到自己的國歌在演唱，和看到自己的國旗在揮動時，都起立歡呼，面部自然地流露出興奮喜悅的表情，有的更齊聲和唱，以宣他們的愛國情懷。我們這一批來自香港的青年，一向受環境影響而忽視了國家觀念，一直以來都不曾產生過一種強烈的意識，在那時各人心中都不其然興起了一種國家思想和愛國的情懷來，但矛盾的是，我們在那時候究竟應何去何從，兩個同

低訴

何麗珠

整晚，我怎麼也睡不着，失眠的老毛病好地說：「心泰身寧是歸處，若有機會到加拿大渡假時必會探望妳。」明明是騙人的話，我竟說：「妳知道嗎？」

那天，我正忙做一份讀書報告，妹妹走過來告訴我，說你本月底到加拿大去，我不大相信，不可能這麼快，不上次見妳不是還說未獲批准的嗎，我懷疑着，又埋怨妳為甚麼不先告訴我，雖然近來我很忙，也應來告訴我對。

晚上，妳終於來了，決定本月底離港，這太意外，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早想到有離別的一天，但想不到如此快，我們正年青，都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願終生留在這小小的地方，外面的天地，或許會適合妳，為妳的前途與幸福，我怎麼不贊成妳去？知妳不能不問，知妳知我最愛哭，想不到却沒有哭。

時存在的中國政府，那一個才有代表性，還是兩個同時捨棄，稱自己為大英聯邦殖民地的子民呢！但當聽到那耳熟能詳（全日播映完畢後）的音樂時，儘管一些人高聲歡呼，我們來自香港的青年沒有一個站起來歡呼，也看不到有興奮的表情，在那時我們才體會到國家的力量，我們才領略到甚麼是歸屬感。就在我們感到被遺忘的時候，一位中年的女表演者踏在舞台上以國語讀出了「我們非常感謝香港團體的光臨」十三個字，雖然她的國語不算標準，但一字一詞清楚嘹亮，已經使我們明白了。我們隨即報以如雷的掌聲，當聽到另外一位表演者在台上以粵語說出「飲勝」二字時，那四十多對手更揮舞不停，正代表着我們心底的呼聲。

校董的訓誥

在歐遊回港的次天，邱志清同學和我一同前往開達實業有限公司，拜訪我們此行的贊助人——我們的校董會副主席丁熊照老先生，以聊表我們的一點謝意。在會談中他給我們說明了青年人的應知進取，但切不可急功近利或行強奪取的手段來獲得成就，應本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宗旨去幹，去奮鬥，才是最基本的辦法，但願同學們皆能自我勉勵，作出對社會有益的貢獻，才不負我們創校人對我們的期望。

文史系三年級

幽美的小徑，會只留下我一人獨步？

人都想避免痛苦，追求快樂，可是實際上痛苦的人多，快樂的人少，就一個人來說，痛苦的時候多，快樂的時候少。

一般人所以苦多樂少，因為他們以慾望的滿足為快樂。想發財的人，發不了財就不快樂；想做高官的人，官不旺就不快樂；想成名的人，藉藉無名就不快樂；其餘可以類推。進一步說，想發財的人，即使真的發了大財，他未必就很快樂。因為發了財之後，他還想做高官，掌大權成大名。

我對本校劇藝之回憶與感想

我們的話劇社之初期是一個興趣小組，由少數志趣相同之同學聚在一起，互相討論研究，當時領導之導師為曾漢文先生。但由於各同學皆是初次參加，而且互相之間認識未深，加上校方缺乏理想之排練場所，未能有良好的開展。

翌年，學校再度成立劇藝探討興趣小組，並邀得著名電視紅星梁天先生負責指導，另外校方更定於在學期末舉行二週年校慶畢業典禮時演出話劇。劇藝組得此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於是參加的同學踴躍異常，第一次到會人數多達四五十人之眾，惜在芸芸四五十人之中，能經得時間考驗的只得十人左右，以我個人觀感而言，大部份是想一睹梁天先生之風采的。但姑勿論事情發展如何。劇！總是要演下去的。於是就着手找尋合適之劇本，最後終於選定演出「克拉拉」一劇，而接踵而來需要解決之問題，就是怎樣選擇合適之時間排演話劇，由於組成話劇組的中堅份子包括大專各系及中學部與夜學部之同學。而各人

牛糞，喝的是帶沙的河水，可是生活却非常愉快。孔子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他却不改其樂。顏回的快樂和那位青年神父之快樂是一樣的，都是由理想的滿足而來。

而我個人對演話劇之興趣，現時亦相當濃厚，同時我自己覺得在人生歷程當中，雖然多姿多彩，但所扮演的，自始至終是自己個人。而話劇可給予你各種機會，飾演各種各類不同之面孔，倘若你對現實社會有不滿的時候，更可借助話劇之演出，盡情地發洩。

志趣與苦樂

司馬長風教授

志趣則決定於自己的選擇。我認為對多數人來說，健全的生活應是調和有節制的生活。理想不必太高太遠，但總應在衣食住行之外有一立己達人的事業，做為終生奮鬥的目標。慾望應得到有節制的滿足。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固然不好，刻苦禁慾的生活，每造成反常心理。

商管系 關慶生

談自殺

社會系 梅振華，馬月笑
新聞系 李國標
會銀系 向仲威

筆者按：這不是一篇專題論文，而是在社會學科小組討論後的一篇報告。我們曾經前往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索取有關資料，經過分析後，輯錄而成此一報告。

如果生的恐懼，戰勝了死的恐怖，那麼他就會勇敢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就是自殺的基本原因。但有一法國社會學家 Emile Durkheim，持有更深入的見解，他對自殺的種類劃分成三種：

(一)無所依從者 Anomic Suicide
由於此類自殺者對社會均無所依從，多數演變成家庭破裂，於是產生了自殺的動機。

(二)自我主義者 Egoistic Suicide
指一般以自我思想行為為主，而思想對社會又不適應，使他在社會孤立。此類自殺者多為無宗教信仰的。

(三)利他主義者 Altruistic Suicide
指該自殺者直接或間接為一羣人，一個團體或一個民族的利益，而作出自殺的行為。

學者 Durkheim 更指出自殺的其他細小原因有貧窮、疾病、家庭背景、天氣、地理因素和國籍。此等原因不能直接及獨立的影响自殺者，多是依賴上述三種原因而構成自殺案件。

在本年九月底，本港發生一宗自殺案件，而嚴重致鬧上法庭，作死因研究。死者為關妙卿，女性，就讀於護士學院。死者於未進護士學校就讀之前，是一個活潑、純真的少女，她懷著滿腔熱誠與希望進入了護士學校攻讀。但是進入護士學校以後，情緒不斷降低，精神沮喪，由一個活潑年青的少女，而變成一個憔悴、恐懼的學生。

原因是學校的老師嚴肅而近乎虐待的態度，功課亦忙到她透不過氣，被老師懲罰時自尊心受損，因被責罵而產生自卑感。對一個朝氣蓬勃的少女，有無所依歸之感，同時更回顧她自己考不進大學，對新環境又無所適從，於是作出了自殺的決定。

從前因後果分析得死者的死因，符合以上的第一種自殺原因 Anomic Suicide 無所依從者之自殺，死者因對新的環境制度，有茫然無所屬的感覺，同時受自卑感的驅使，而直接產生了自殺的動機。

另外一個實例，我們可從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荆軻傳裏知道戰國期間的一段歷史故事：

樊於期是秦國的逃亡將軍，秦王懸賞黃金千斤，食邑萬家來緝拿。樊於期逃到燕國，燕國太子丹以上賓之禮來招待他。因太子丹本為秦國人質，後逃亡出走，所以對秦王非常痛恨，得一勇士荆軻計劃刺秦王，但荆軻要得於期的頭顱和燕的督亢地圖做信物，奉獻秦王，然後可以晉見太子丹。太子丹不忍，於是荆軻私自去見於期，說明自己的意思，於期聽完之後，毫不考慮地自刎而死。

根據這一段歷史故事，我們可以判定樊於期的自殺乃屬於利他主義者的自殺 Altruistic Suicide，他本人非常痛恨秦王，這是基於他個

人的理由，而他為報答燕太子丹亦是原因之一，然而他自殺是直接及間接有利於燕國及其他國家。歸納起各點原因，是屬於利他主義者之自殺行為。

據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發表一九七二年之中，自殺總人數達三百三十人，男子佔一百四十七人，女子佔一百八十三人，自殺總人數較七一年減少一百三十八宗，自殺者以二十一歲至四十五歲居多，佔一百七十八人。

自殺率最高月份為一月，佔12.12%
自殺率最低月份為十一月佔3.94%
自殺原因：

原因不詳，佔229人，69.4%
因疾病佔50人，15.15%
自殺地點：

主要是在家中，佔152人，46.06%
從資料中顯示出一九七二年自殺人數較七一年有大幅度的減少，分析原因有：

(1)一九七二年為本港較為安定的一年，反映出香港人在情緒上得到短暫的平靜。
(2)一九七二年為罪惡激增的一年，若干人在不同的情況下，不同的程度上，發洩了自己的感情，使暴力罪案大增，以致傷人而不自傷，殺人而不自殺。

自殺率最高為一月，陽曆一月剛是接近農曆新年的期間，由此觀點看來，大多市民因經濟問題無法解決，自各方面的壓力增加，唯有一死，以致該月自殺人數劇增。

自殺原因以疾病為其次，這一點反映出本港的醫療設備普及，這亦是當局應注意的問題，改善醫療設備就是減少自殺人數的要點之一。
本港自殺者的特色，就是沒有利他主義之自殺形式存在。這可能是直接與香港的政治與國家背景有關。

社會學家 Emile Durkheim 提出自殺的三種主因，但在討論之餘，證明兩種主因是可以同時存在一件自殺案件中：

三島由紀夫是近代日本的作家，為一激烈的極右派份子，亦是反共的民族主義團體「循之會」的會員，他激烈的思想時常洋溢於他的作品內。在他自殺那天，他率領循之會的會員，衝入東京自衛隊司令部，督持基地指揮官，然後他走出陽台，向千餘官兵發表演說，因官兵不為他的主義所動，於是他以傳統武士道自殺方式——切腹自殺。

在各方面人仕，對三島之自殺，都有不同意見：

(1)美國前任駐日大使，哈佛出身的歷史學者賴士和，認為三島自殺，不足為異，因為三島近年來的態度越來越趨極端，顯已失去理性的平衡。
(2)將三島作品譯成英文的百斯特說：「他離開了文藝，他簡直可以當作病人看待。」
(3)哈佛歷史學者，研究武士道的專家，柯瑞格指出：日本文學界本來就有喜歡自殺或有

常想到自殺的傳統，有位名作家會說過：「人生惟有死亡、自殺和瘋狂才是可敬的。」因此柯氏認為三島自殺，並非完全為了一「愛國」，而更有其他心理背景。

我們對三島之死的一點分析：
(1)利他主義者的自殺 Altruistic Suicide
三島將自己幻想成古代武士、民族英雄，以一死來喚醒了國民及自衛隊。

(2)自我主義者的自殺 Egoistic Suicide
三島的思想是極右的，而崇尚武士道精神，因這一套思想完全與現今社會制度脫節，形成了他孤立的及理性上的不平衡。

(3)國籍
日本文學界傳統喜歡自殺或常想到自殺的。
(4)政治因素
因日本左派的高漲，而影响到他極右派的激動。

人間悲劇

外文系一年級 慈

昨天放學前最後一節課是一年級的英文，下課前十分鐘我讓學生做功課，我和一個從未見他笑過的男生閒談，知道他是寄宿生。當我問他原因時，他眼圍開始紅了，跟着眼淚大顆大顆地從他那雙大而無神的眼裏滴下。當他斷斷續續地告訴我父親不知去向，母親把他兄弟倆送來寄宿時，身體抽得痛得很厲害，我無限憐愛地擁着他，安慰他。

隣座的班長李永杰很關心地問我：「老師，郭英傑為什麼哭？」我推說不知，因為他也是因家庭破裂而被送到學校寄宿的，我何忍勾起他的感傷呢！

當郭英傑回座時，李永杰走過去，輕拍着他的肩膀問他，面前這情景刺痛了我心靈的創傷，乘着眼淚還未湧出來前，我趕快走出課室，當拭乾了眼淚，走回課室時，這對可憐的孩子仍坐在一起：一個眼淚不停地流，一個輕輕地說着慰言，我靜靜地望着他們，但內心在大喊：「上帝呀！看看這兩個孩子，看看這殘酷的世界，為何仍靜默無聲！」他們才六歲多，便要忍受這些苦楚，以致身心不正常。

下課後，李永杰走到我身旁，眨動着那雙顯示着聰慧、生動的眼睛說：「老師，我剛才見郭英傑哭時，我也差點哭出來呢！他比我還慘，我兩星期回家一次，他却不能回家。」我的眼淚又要奪眶而出，我在內心對他說：「孩子，難道我不難過嗎？我們雖然身份不同，但却有同一命運啊！」

這就是我們居住的世界——殘酷、冷漠、痛苦，表面上却七彩繽紛，每人都負着一個沉重的担子，這担子內盛滿痛苦憂傷，無可奈何，而這些担子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人到世界似乎只為償還這些痛苦的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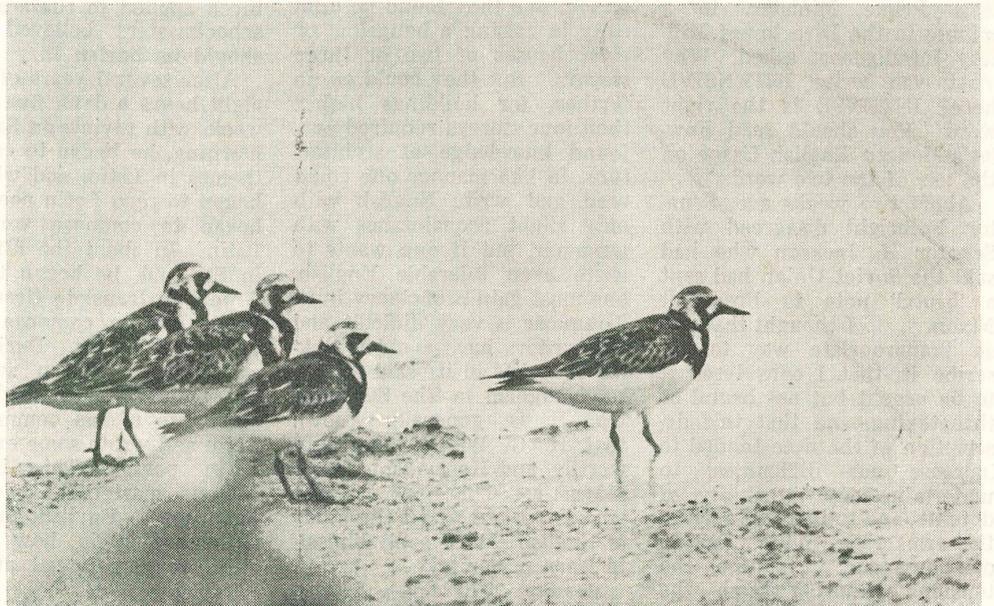
shows. Appeal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ep Bay Marshes have fallen on deaf ears; yet these areas belong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are among their few natural treasures. Surely such treasures are worth preserving from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r decay through squatter developments and other results of ineffective land use planning.
16.10.73 M. A. WEBSTER

(Continued from page 6)
Natural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o make way for new towns, roads, and picnic areas will restrict the number of places where this wide variety of birds can be found. Frequent grass and forest fires produce a type of vegetation which is unsuitable for most species. Hunting, illegal netting, and other forms of trapping birds all have their effect. However, many of the more common species have managed to resist these kinds of disturbance remarkably well; there is no sign that the three common Bulbuls, Chinese, Crested, and Red-vented, are becoming any less common, or that the White-eye, the most commonly trapped bird of all, is becoming any rarer. The Hwamei, another species commonly trapped, did almost disappear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but this is making a welcome comeback.
Hong Kong has sound laws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but virtually no means of enforcing them. Hunting is banned in most areas, though this is also not well enforced, and anyway it probably encourages netting, which is also illegal. The increasing use of the countryside for recreation, which is encouraging i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life in Hong Kong, is bound to affect the bird life by producing excessive human in-

terference.
Hong Kong has a variety of birds comparable with most places of similar area anywhere in the worl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ropical jungles). While this bird-life is bound to be affected by human interference, it is a valuable scientific asset, and we should be taking realistic steps to look after it. The answer is a limited number of selected areas set aside as nature reserves, with access restricted, or only permitted along set routes.
One such sanctuary has been established at Sha Tau Kok, where the large colony of egrets at Yim Tso Ha is protected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is egretty contains the only known breeding population of Swinhoe's Egret outside mainland China; only two or three pairs but since the evidence, such as it is,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very few left inside China, they are worth preserving. The birds nest in a small fung shui wood on a hillock behind the village, and entry to this wood is prohibited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By setting aside two or three other areas, not quite as small as this, we could do our best to ensure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can see as wide a variety of bird life as we can. Since most of the birds are migrants

or winter visitors, we cannot provide 100% protection, as we have no control over what happens in their breeding grounds.
The two areas of greatest interest are the Deep Bay Marshes and the Tai Po Kau Forestry Reserve, both of which need full protection. Although neither of these two areas is heavily utilised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s at present, they are threatened, the Deep Bay Marshes by more

intensive utilisation for fishponds, and also by illegal netting of birds, and Tai Po Kau by decoy trapping. If both were administered as proper nature reserves, with a full staff of wardens, they could become for greater recreational assets that they are at present without disturbing the birds.
This needs planning and money; more than that, it needs a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the future whic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arely



Turnstones

— David Galloway

ON LEARNING ENGLISH

More than three weeks ago, two student-editors asked me to contribute to the *Jen Hsin*, saying that the article should be of the nature of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 had my hands full and was hard pressed for time. But their eagerness and smiling faces as much moved me that I consented. I felt it a shame to let them down. As a lecturer in English, I could only write about the study of English from experience. This is how the following came to be written.

I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English I shall not elaborate here, for it is generally known and for the journal could only afford a limited space.

II

In comparing English with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Dean W. R. Inge said in his *ENGLAND*, 'French excels in precision, and is a perfect instrument in the hands of a good prose writer; German, though not euphonic, will do any work to which it is put. Ancient Greek probably exceeds all other languages in beauty, precision, and flexibility combined. But we may claim that English is very high among the great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o me English is a powerful and beautiful language, and the more I know it the more I like it. Day in, day out, I spend hours reading and sometimes writing it. I find it a tool potent enough to put down things. However, I do agree with the Dean when he in the same passage said, ' . . . We must admit no language is worse spoken or worse written.' He meant that the English people did not speak and write English well enough as for instance the French did their language. While I am in no position to venture any opinion on spoken English, I do subscribe to the Dean's point of view about written English. I often urged my students to read the best written or the best writers. But when they asked to name a few, I was in a puzzle and found it difficult to name any. Of course I told them to read Shakespeare, Swift, Thackeray, 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 and any book by Dean W. R. Inge.

To write good English is a craft one has to learn and practise. Even 'the right use of words should be a matter of life-long study,' said Edwin L. Shuman in his *PRACTICAL JOURNALISM*. For instance, Winston Churchill, the War-time Prime Minister, in a minute to the Director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asked, 'Why must you write INTENSIVE here? INTENSE is the right word. You should read 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 on the use of the two words.'

About two weeks ago, Senator Fulbright disagreed with Senator H. Jackson who had said the Soviet Union had sent a 'brutal' note to President Nixon. ' . . . I thought that was an inappropriate way to describe it, that I considered it to be urgent but not brutal or threatening, and that this description of the note tended to increase our difficulties, to undermine any possibility of detente, and to increase further the arms race, military appropriations, and in general the tensions resulting from the war, which are already very

grea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7, 1973) How correct it is when Swift said, '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style.' But here it is not a matter of 'style', but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perhaps millions of lives.

Further, if one just glances over the King's English by the Fowler brothers, which, *The Times* said, 'took the world by storm,' one will be surprised to see that solecisms and barbarisms were spotted here and there and everywhere in the Press such as *Times*, *Spectators*, *Westminster Gazette*, *Daily Mail* and *Daily Express*; and in works, speeches and documents by literary and political giants such as E. F. Benson, C. Bronte, Dickens, Meredith, Gladstone, Kipling, Trollope, Burke, Bryce, Scott Lamb, Thackeray, Balfour, Macaulay, Carlyle, Huxley, and De Quincy.

All the pains I have taken to show that English is a language very hard to learn, and that we should bend all our efforts to the study of it if we have a great mind to write tolerable English, and that English could never be learnt half-heartedly. Strange to say, I have come across almost no Chinese who would believe it hard to learn English.

III

How to learn English has been a concern of mine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Now I think Francis Bacon's dictum: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and the title of E. V. Lucas' *Reminiscence 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 point out the way for us Chinese to follow. How could we learn English otherwise?

As grammar deals with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so I have often likened it to architecture. In my native country about fifty years ago, almost every farmer was a carpenter, a bricklayer, and sometimes a mason, and they found no difficulty in raising a bungalow or even houses of two or three storeys. But they could go no further, for buildings higher than four storeys required profound knowledge of architecture. In like manner one could read and write English with only slight acquaintance with grammar, but if one wants to write even tolerable English, one must gain proficiency in it. 'Grammar is very difficult and few writers have avoided making mistakes in it,' said Somerset Maugham in *The Summing Up*. It is generally known that H. G. Wells, John Galsworthy, and Henry James were solecistic. Therefore anyone who is serious about the study of English should apply himself to learn grammar.

Reading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ding for in-

formation or pastime, and reading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for the former, one could dismiss a book or an article in no time as long as one has caught the salient points and can reproduce them in one's own words; whether the reproduction is well or badly put down does not count. As for the latter it is a very strenuous task. One should forget the word 'efficiency' but bear in mind that 'the right use of words' results from familiarity with the senses of every word, which would take many a year. Having read a passage or page, one should pause and ask oneself whether one could express oneself as well. Then one should try to memorize the senses of each word, each expression or sentence, and each phrase or idiom, and one should have at least five to ten dictionaries at hand for reference.

Writing Reading alone is not enough. Only when one begins to compose themes in English does one come to understand English perfectly. Because when one writes one wants to convey exactly what one means. Thus one has to weigh each word or idiom or phrase, and one has to arrange one's thoughts before setting them down on paper. That is what Francis Bacon really meant when he said, ' . . . writing maketh an exact man.'

Some say, 'A wise man learn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but a wiser man learns from others' experiences! Now let us try to be wiser and learn from John Milton, Benjamin Franklin, and W. Somerset Maugham.

When John Milton, author of *Paradise Lost*, entered Christ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1625, he was already proficient in Latin after seven years of studying it at St. Paul's school. Like all his classmates he memorized rules, frequently in verses to make learning by heart easier. He parsed the nouns and conjugated the verbs. He translated Latin into literal English first and into idiomatic English later, and finally he translated his English back into Latin without referring to the original version. The schoolmaster was at hand to encourage and admonish with the ferule applied to the hand or birch applied to the seat. All schoolmasters believed Latin should be beaten i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study, eight hours a day, five days a week, with review on Saturday morning, he began to compose themes in Latin, and when he began to read Latin poetry, he began to compose verses in Latin. In about the fifth year in St. Paul, he began to read Greek, to translate Greek into Latin, and to compose Greek prose and verses. During the seven years Milton spent at the university, he made constant use of his command of Latin and wrote some excellent Latin poetry. This is how Milton mastered the three languages — English, Latin and Greek. This is how Milton still lives among us and will never die.

Benjamin Franklin only had

two years schooling. His English was self-taught. This is how he learnt it.

One day he bought an odd volume of *Spectator*. He thought the writing excellent, and wished to imitate it. He took some of the papers, and, making short hints of the sentiment in each sentence, laid them by a few days, and then, without looking at the book, tried to complete the papers again, by expressing each hinted sentiment at length, and as fully as it had been expressed before, in any suitable words that should come to hand. Then he compared his *Spectator* with the original, discovered some of his faults, and corrected them.

He also began writing verses. He wanted a stock of words or a readiness in recollecting and using them. Therefore he took some of the tales and turned them into verses; and after a time, when he had pretty well forgotten the prose, turned them back again. He also jumbled his collections of hints into confusion, and after some weeks, endeavoured to reduce them into best order, before he began to form the full sentences and complete the paper. This was to teach himself method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oughts.

W. Somerset Maugham, in the Foreword to *OF HUMAN*

BONDAGE, said, 'For long after I became a writer by profession I spent much time on learning how to write and subjected myself to a very tiresome training in the endeavour to improve my style.' This 'very tiresome training' we can find in his *THE SUMMING UP*. There he said, 'I studied Jeremy Taylor's *Holy Dying*. In order to assimilate his style I copied out passages and then tried to write them down from memory.' Later he was enchanted by Swift. He said, 'As I had done before I copied passages and then tried to write them out again from memory. I tried altering words or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were set. I found that the only possible words were those Swift had used and the order in which he had placed them was the only possible order. It is an impeccable prose.'

Finally I must add a few words on memory without which one cannot learn anything, especially a foreign language. While John Milton must have a wonderful memory, Benjamin Franklin and Somerset Maugham developed their memory through 'tiresome training.' We could do the like, and without doing so we shall never gain a good comman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YEN CHIH-SHITS

Birds in Hong Kong

For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the densely crowded urban areas, it may be difficult at times to realise that Hong Kong has fairly large areas of open countryside. It may seem even more unlikely that anybody should think of Hong Kong as a place to study birds. Yet over 370 different species have been recorded here; if you work at it hard enough, you can see over 200 in a single year.

The area which attracts the largest numbers of different species is the Deep Bay marshes between Ping Shan and Lok Ma Chau. It is not unusual to see 60 species there in a single day. The majority of these are birds which live near water; for many of them, these marshes are the only place in the Colony which still provides a suitable habitat.

Hong Kong owes its wide variety of bird life to two main factors. Firstly, it is roughly on the border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Palearctic zoogeographical regions. In simpler terms, birds in tropical countries tend to stay in the same place all the year round, whereas those which breed in the more northern countries where there are sharply contrasted seasons move southwards in autumn to spend the winter in warmer regions. The difference in life-styl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has produced distinct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differences in shape). Thus a fairly clear dividing line can be drawn between the Oriental species, and the northern, or Palearctic, species. The difference in shape which makes this division is fairly obvious when you come to think about it; if a bird has to make a long migratory flight twice a year to and from its northern breeding quarters, it

must be designed so that it is capable of sustained flight over long distances.

Many migrations cross long stretches of ocean, and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t least one group of small birds flies non-stop from Hong Kong to Borneo or Palawan. Before the flight starts, the birds build up a reserve of body-fat, which gives them the energy they need. Up to half their body-weight may be lost in a long flight such as this.

The second factor which produces a wide variety of birds in Hong Kong is the fact that it lies right on one of the main north-south migration routes used by the Palearctic birds. This route roughly follows the coast of eastern Asia, cutting across the bulge of South China, and crossing the sea from Hong Kong to Hainan or even North Vietnam. The other main migration route in the Far East is from Japan, via the Ryukyus,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to Borneo. As Hong Kong is the place from which the sea-crossing starts, fairly large numbers of birds rest here before setting off for Vietnam, or after the sea-cross on their way north.

Breeding birds are comparatively few; only 70 or so of the 370 species breed regularly.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we do not have the sub-tropical monsoon jungle which the majority of tropical birds require, and which used, many hundreds of years ago,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Hong Kong's hills.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reserves is beginning to change this, and we are now at the stage of recording new breeding species most years as the forest becomes suitably dense and varied for them.

(To be Continued on page 5)